

第8卷·第2期

(总第32期)

Vol.8 No.2

经济学(季刊)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论文

- 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贸易政策
东 艳：深度一体化
洪之涓：“亚洲间贸易”论
朱殊洋：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探讨
冯维江：侠以武犯禁
瞿宛文：中国产业政策模式
寇宗来：技术差距、后发陷阱和创新激励
章上峰、许 冰：时变弹性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
李锋亮等：过度教育与教育的信号功能
庞 春：为什么交易服务中间商存在
白让让、王小芳：中国电力产业的接入歧视
孟大文、田国强：网络外部性与非线性定价
陈晓红等：全流通影响了市场波动性吗
叶德珠：投名状 vs. 污点证人制度
刘学军、赵耀辉：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陈立中：收入增长和分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
黄季焜等：生物燃料乙醇对区域农业发展的影响

书评

- 韦 森：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学:季刊. 第8卷. 第2期/林毅夫,姚洋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301-14906-5

I. 经… II. ①林… ②姚… III. 经济学-丛刊 IV. F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464 号

书 名: 经济学(季刊) 第8卷·第2期

著 作 责 任 者: 林毅夫 姚 洋 主 编

责 任 编 辑: 朱启兵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301-14906-5/F·2121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子 邮 箱: ceq@ccer.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8908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87 mm×1092 mm 16 开本 25 印张 488 千字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国 内 定 价: 48.00 元

International Price: US\$ 24.00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经 济 学 (季 刊)

第 8 卷 第 2 期

(总第 32 期)

2009 年 1 月

目 录

论 文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

——以 PNTR 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分析

..... 李坤望 王孝松 375

深度一体化、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区战略 东 艳 397

“亚洲间贸易”论的理论述评及其现实意义 洪之渭 427

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探讨

——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问题的考察 朱殊洋 443

侠以武犯禁

——中国古代治理形态变迁背后的经济逻辑 冯维江 465

超赶共识监督下的中国产业政策模式

——以汽车产业为例 瞿宛文 501

技术差距、后发陷阱和创新激励

——一个纵向差异模型 寇宗来 533

时变弹性生产函数与全要素生产率 章上峰 许 冰 551

过度教育与教育的信号功能 李锋亮 岳昌君 侯龙龙 569

为什么交易服务中间商存在? 内生分工的一般均衡分析 庞 春 583

规制权力配置、下游垄断与中国电力产业的接入歧视

——理论分析与初步的实证检验 白让让 王小芳 611

网络外部性与补偿激励下的非线性定价 孟大文 田国强 635

全流通影响了市场波动性吗

——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 陈晓红 余 坚 周 颖 659

投名状 vs. 污点证人制度

——团伙犯罪刑罚设计的行为法经济学分析 叶德珠 679

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刘学军 赵耀辉 693

收入增长和分配对我国农村减贫的影响

——方法、特征与证据 陈立中 711

发展生物燃料乙醇对我国区域农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 黄季焜 仇焕广

Michiel Keyzer Erika Meng Wim van Veen 727

书 评

再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韦 森 743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Vol. 8 No. 2

January, 2009

CONTENTS

Papers

- The Determining Factors of U. S. 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Illustrated by
the PNTR Bill Kunwang Li and Xiaosong Wang 375
- Deep Integration, FDI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FTAs
Strategies Yan Dong 397
- "Intra-Asian Trade"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Meanings Zhijuan Hong 427
- An Exploration of the Growth Rates of the Two Big Sectors:
The Priority of the Producer Good Sector Revisited Shuyang Zhu 443
- The Economic Logic of the Evolution of Governing Models
in Ancient China Weijiang Feng 465
- The Chinese Model of Industrial Policy under the Catch-up
Consensus: the Case of the Automobile Industry Wanwen Qu 501
- Technological Gaps, the Trap of Backwardness and Incentives
for Innovation: A Model of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Zonglai Kou 533
- Production Functions with Time-Varying Elasticities and under
the Catch-up Consensu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 Shangfeng Zhang and Bing Xu 551
- Over-education and the Signaling Function of Education
..... Fengliang Li, Changjun Yue and Longlong Hou 569
- Why do Commission Middlemen Exist?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of Endogenous Division of Labor Chun Pang 583
- Allocation of Regulatory Rights, Downstream Monopoly and
Access Discrimination in China's Power Industry: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s
..... Rangrang Bai and Xiaofang Wang 611
- Nonlinear Pricing with Network Externalities and Countervailing
Incentives Dawen Meng and Guoqiang Tian 635
- Does Circulation Affect Market Volat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 Xiaohong Chen, Jian She and Ying Zhou 659
- Toumingzhuang* vs. Stain Witnesses: A Behavioral Law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Penalty Design on Gang Crimes Dezhu Ye 679
- The Impact of Labor Migration on Urban Labor Markets in China
..... Xuejun Liu and Yaohui Zhao 693
- The Impact of Income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on
Poverty Reduction in China's Rural Areas Lizhong Chen 711
- Impacts of Bioethanol Development on China's Reg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Jikun Huang, Huangang Qiu,
Michiel Keyzer, Erika Meng and Wim van Veen 727

Book Review

- North's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From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o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 Sen Wei 743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 ——以 PNTR 议案投票结果为例的政治经济分析

李坤望 王孝松*

摘要 本文运用贸易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对2000年美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检验,以此来分析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直接决定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受哪些因素影响,并指出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通过分析,我们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是政府和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均衡结果,议员的个人因素在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几乎不能发生任何作用,经典贸易模型所预测的不同群体对贸易自由化的态度不能完全被议案的投票结果所证实。

关键词 美国, 对华贸易政策, 政治经济分析, PNTR 议案, 利益集团

美国是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同时也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其对外贸易政策与中美经贸交往息息相关,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重大。由于美国自身具有许多特点,以及中美两国关系的复杂性,因此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决策机制,这需要我们新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本文采用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为基本分析框架,剖析美国对华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背后隐藏的深层次政治经济因素,以期中美之间更好地开展贸易活动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定量地分析一国对某个特定的贸易伙伴实行的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绝非易事。首先,大多数正式的理论模型中包含了一些无法得到的结构参数,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进行经验检验;其次,一些非正式的模型和极少量的正式数理模型可以用于经验检验,但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提出的分析框架研究的是一国不同行业之间的贸易壁垒差异(即保护结构)的形成原因,而没有刻画贸易壁垒的国别特征;再次,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纷繁复杂,很短的时期内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而在一个框架下定量分析这些

* 李坤望,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300071;E-mail: likunwang@nankai.edu.cn。王孝松,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300071;E-mail: wangxiaosong@mail.nankai.edu.cn。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美经济贸易依存度对中美双边关系的影响和制约研究”(项目号 05BGJ006)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南开大学数量经济研究所赵红梅教授在计量技术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政策 (及其变化) 的形成因素更是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我们的具体做法是: 对 2000 年美国国会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PNTR) 地位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检验, 以此来分析国会议员的投票行为 (直接决定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 受哪些因素影响, 并指出这些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 通过这样的分析, 我们将更清楚地理解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机制。

一、背景介绍和相关文献回顾

(一) 背景介绍

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正常贸易关系) 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一项重要决策内容, 直接影响着中美双边贸易的开展。在 1990 年到 2000 年之间, 最惠国待遇 (正常贸易关系) 的审议过程和结果更是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风向标。而 2000 年国会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 PNTR 这一事件, 既是对每年评议中国贸易地位这一历史的终结, 又为此后对华贸易政策的走势确立了一个总的基调, 所以我们认为该事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形成过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而且, 给予中国 PNTR 的议案是克林顿总统提出的, 而此次国会投票表决又是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在贸易领域的最后一次重要表决, 利益协调、各方博弈、个人政治偏好等因素也可以从投票结果中展现出来。综上所述, 尽管一项议案的表决并不能全面揭示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 但通过对议案投票表决的经验分析, 我们的确可以得出一些有意义的重要结论。

最惠国 (MFN) 待遇是国际贸易中各国之间相互给予的正常待遇。¹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美国国会开始年度审议最惠国待遇问题。这种做法源于美国国会对《1974 年贸易改革法》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 该修正案否决了美国总统授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或者阻碍自由移民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最惠国待遇的一揽子权力, 其针对的是当时苏联的移民政策。

美国总统若想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就要确认中国完全与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的条件相一致, 或者放弃对中国具有完全一致性的要求, 即行使放弃权。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 总统的放弃权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从 1980 年到 1989 年 5 月, 美国总统一一直对中国行使放弃权, 要求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而国会也一直没有反对, 所以这十年间, 对华给予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议每年都顺利通过。但 1989 年 6 月 4 日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 很多国会议员要求撤销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作为对其违反人权准则的经济制裁。

¹ 1998 年 7 月, 克林顿总统签署一项税收改革法案, 将“最惠国待遇”的提法改为“正常贸易关系” (NTR)。

此后的十年间，围绕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总统、议员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成为总统候选人宣扬“扩大民主”的手段，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就曾宣称要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而最惠国待遇同人权挂钩是其手中的武器；许多国会议员把一年一度的对华最惠国待遇审议作为武器来表达对总统执政方针的不满；不同的利益集团更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游说国会议员，当劳工和人权利益集团占上风时（如1993年和1994年投票表决期间），中国的最惠国地位便岌岌可危。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工商业利益集团同国会紧密联系，有效地影响了对华贸易政策的制定，它们为了扩大对华出口，极力主张保持同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当2000年克林顿总统提出了给予中国PNTR的建议时，工商业组织鼎力支持，并且完全控制了这场政治斗争的局势。最终，参众两院均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总统提出的给予中国PNTR的议案：众议院的投票结果是237票支持，197票反对；而参议院的投票结果更是毫无悬念，以81票支持、13票反对的比例顺利通过。

（二）相关文献回顾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模型来阐释和描述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意图、决策过程、机制和影响因素，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经济学的一个庞大分支，Baldwin（1985）、Helpman（1995）、Gawande and Krishna（2003）都曾经对这一领域的文献进行过精彩的评述。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对影响PNTR议案投票结果的各种政治经济因素进行经验分析，来剖析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决策和形成因素，因此我们仅对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进行回顾。

先来看理论模型。Mayer（1984）假定个人收入是所拥有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收益与国家关税收入的再分配之和，每个选民依据各自要素的产权组合计算出自己的最优关税率，而国家的贸易政策（关税率）由公民投票直接决定，所以在没有投票成本时，中间选民²的最优关税率就是国家的关税率。Findlay and Wellisz（1982）分析了利益相抵触的两个集团如何通过游说等院外活动来促使关税形成，从而构造了一个关税内生化的均衡模型。而Hillman（1982）的政治支持模型认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得到全社会在政治上的支持，因此它在利益集团和消费者的政治支持之间进行权衡，而关税率是政府进行权衡（求解政治支持最优化问题）之后的选择。Grossman and Helpman（1994）建立了“保护待售”模型，该模型描述了利益集团同政府之间进行两阶段非合作博弈、最终形成贸易政策的过程。首先，利益集团之间在“捐资

² 如果根据选民对关税率高低的不同偏好，将所有选民排成一条直线段，从左至右选民赞成的关税率逐渐升高，那么所谓中间选民，就是恰好位于直线段中点的选民。

表”上达成关于政治捐资的纳什均衡；然后，政府在给定的政治捐资水平上再决定最优的价格（即均衡的贸易政策）。模型的结论是：一国对各行业的保护水平取决于不同行业的进口弹性、进口渗透率（的倒数），以及是否能有效地组成利益集团。

再来看经验检验方面的文献。由于 Findlay and Wellisz (1982)、Hillman (1982) 等模型中都包含无法得到的结构参数，因而无法直接进行经验检验。所以，对贸易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的检验基本上都是围绕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的“保护待售”模型展开的。Goldberg and Maggi (1997)，Gawande and Bandyopadhyay (2000) 使用 1983 年美国制造业数据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检验，他们发现，模型的基本结论能够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即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捐资“购买”到贸易保护政策。Mittra, Thomakos and Ulubasoglu (2002) 使用土耳其数据、McCalman (2004) 使用澳大利亚数据，分别对“保护待售”模型进行了经验检验，其结果依然支持模型的理论假说。

“保护待售”模型的主旨还意味着：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活动可以对贸易立法过程产生影响。因为贸易政策是通过与贸易有关的立法而形成的，所以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资“购买”到贸易保护政策的过程就是通过政治捐资影响贸易立法的过程。这又引发了学者们对贸易议案投票结果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

在这方面，Baldwin (1985) 首开先河，详尽地分析了影响国会议员的贸易政策倾向形成的政治经济因素，包括议员所在选区的政治经济特征、议员所属政党的政策态度、议员与同事和总统的关系，以及议员个人的学习、工作背景及其怀有的社会经济目标。在对上述因素进行分析之后，Baldwin 提出了一些理论假说，并用正式的计量方法考察了种种因素是否能对《1974 年贸易改革法》的投票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其结论为：议员支持贸易保护的态度与工会捐资、所在选区中进口敏感行业工人的比例正相关，与表示党派的变量负相关。³ Baldwin 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剖析了国会议员投票行为背后的原因，尤其是把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作为解释变量纳入计量模型，清晰地阐明了政府和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对贸易政策出台的决定性作用，并开创性地对某一具体贸易议案的表决结果进行了经验检验。

Baldwin (1985) 的研究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此后，一批学者把政治捐资作为解释变量来分析国会对贸易议案的表决结果，以此来考查影响议员投票结果的原因及重要程度。其中 Kahane (1996)，Steagall and

³ 所考察的议案是属于共和党的总统提出的，Baldwin 在设定表示党派的虚拟变量时，将共和党人设为 1，而设定被解释变量时，将“反对”（即支持贸易保护的态度）设为 1，所以这两个变量之间的预期关系为负相关，而检验的结果正是如此。

Jennings (1996), Holian、Krebs and Walsh (1997), 以及 Uslander (1998) 对美国国会表决是否通过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的投票结果进行了经验检验。在 Baldwin (1985) 的基础上, 这些学者进一步将政治捐资分为劳工组织的捐资和商业集团的捐资, 并把两者一同纳入到计量模型中以考察不同性质的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程度。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劳工组织的捐资同支持建立 NAFTA 的可能性呈负相关关系, 而商业集团的捐资同支持的可能性呈正相关关系。

上述文献存在一个共同问题: 学者们均采用单方程估计方法, 将政治捐资视为外生变量。但正如 Chappell (1982) 和 Stratmann (1991) 指出, 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数额显然会受到议员投票结果的影响, 因此政治捐资具有内生性。这样, 如果用单方程估计, 政治捐资就会与方程的残差相关, 从而不能保证估计结果的无偏性。

Baldwin and Magee (2000) 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发生在 1993 年到 1994 年之间三个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 建立 NAFTA、签署乌拉圭回合协议和 1993 年给予中国 MFN 待遇。考虑到政治捐资的内生性, Baldwin 和 Magee 将三个议案的投票结果和两种政治捐资纳入一个联立方程系统, 对五个方程进行联合估计, 得出了如下结论: 在政治捐资方面, 捐资与相应的利益集团给议员的打分正相关; 与议员是否在重要的委员会任职正相关; 商业集团的捐资还与议员的任期正相关。在投票结果方面, 支持 NAFTA 议案和乌拉圭回合议案的可能性与商业捐资和出口行业与进口行业就业人数之比呈正相关关系; 与劳工捐资、工会人口比例呈负相关关系; 与不同利益集团的打分具有或正或负的相关关系。而给予中国 MFN 待遇的可能性与某些利益集团的打分、纺织业就业人口比例负相关, 与出口行业与进口行业就业人数之比、失业率、食品行业就业人口比例正相关。⁴ Baldwin 和 Magee 还进行了一系列模拟, 证明了各种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对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 甚至可能会直接决定议案能否通过。另外, 他们还模拟出了每张选票的价格, 即利益集团需要花费多少捐资来改变一位议员的投票结果。

Baldwin and Magee (2000) 的检验不仅证明了贸易的政治经济学中提到的部分重要理论假说, 而且验证了政府和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对美国贸易政策形成的重要影响, 从而说明在一定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 贸易政策是“用于出售的”。此后, Fisher, Gokcekus and Tower (2002) 分析《1999 年两党联合钢铁保护法案》的投票结果、Olson and Liebman (2004) 分析国会通过《连续倾销与补贴抵消法案》(《伯德 (Byrd) 修正案》) 的影响因素, 都是借鉴了 Baldwin and Magee (2000) 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他们的工作也为本文接

⁴ 对这个议案的分析结论显得有些奇怪, 因为计量结果显示, 给予中国 MFN 待遇的可能性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无关, 而且选区的失业率越高, 代表该选区的议员越倾向于支持给予中国 MFN 待遇。

下来的经验分析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二、理论框架

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包含很多理论假说,我们在各种假说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美国国会议员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 PNTR 地位的分析框架。

国会议员的目标是使其连任的几率最大化,而连任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其所在选区的普通选民的支持,二是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活动捐资和信息的支持,因此,议员在参与立法活动时必然要兼顾这两方面的利益。对于贸易议案来说,不同的选民基于自身所处的地位会对议案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利益集团对议案的态度更是大相径庭,而普通选民与利益集团之间也常常会发生冲突。那么,对一项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就反映了议员权衡各方面利益的决策。

尽管不同的主体对贸易议案的态度千差万别,我们仍可以将其归并为两类:支持贸易自由化的一方和反对贸易自由化的一方。两种经典的贸易模型可以预测不同主体对贸易自由化所持的态度,一是 Heckscher-Ohlin 模型,二是 Ricardo-Viner 模型。在 H-O 框架下,国际贸易使一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受损,使相对丰裕的生产要素获益。由于假定要素可以在部门间自由流动,所以无论生产要素被用于哪个部门,都不会改变上述结论。从现实来看,美国是一个非熟练劳动相对稀缺的国家,则根据 H-O 模型,一个选区中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口比例越高、人均收入越低,该选区的选民越倾向于反对贸易自由化。显然,给予中国 PNTR 地位是贸易自由化的政策,所以具有上述特征的选区的议员会倾向于反对该议案。另外,2000 年以前,中国对美贸易的最大优势来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抢占了美国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美国非熟练劳动力失业,所以一个选区的失业率越高,代表该选区的议员也倾向于反对给予中国 PNTR 地位。

相反,Ricardo-Viner 模型假设生产要素完全或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应用于特定行业。例如,某种自然资源或特定形态的物质资本只适用于一个或几个特定行业;或者,某行业的工人只具备本行业的专业技能,这种技能在其他行业无法施展。这样,根据 Ricardo-Viner 模型,个人对贸易自由化的态度取决于他所工作的部门,而不是取决于他所拥有要素的状况。所以,在分析议员投票结果的影响因素时,除了考虑反映生产要素状况的那些变量,还要考虑议员所在选区各部门的就业状况,以判断特定行业对议员决策行为影响的重要程度。

议员的个人特征可能也会对议员的投票结果产生影响。第一,国会议员对以往各项议案的投票结果都会被记录在案,各利益集团会根据议员的投票结果是否符合自身利益而为议员打分,不同利益集团给议员的打分可以反映

出议员的政策取向。第二，一些议员认为，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不会对自己甚至自己所在的选区产生较大的影响，所以他们在投票时可能更多地基于其所在党派、所属委员会的立场。第三，对议案的投票是议员向选民展示自己的政治抱负、社会理想的绝好时机。在对议案表决的过程中，他们或者表现出对劳工的同情，或者展现出崇尚自由的决心，或者表现出关注国家安全的热情，以迎合选民的需要，从而增加连任几率。综上，我们必然要将反映议员个人特征的诸变量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

很多学者，如 Findlay and Wellisz (1982)，Hillman (1982) 以及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4) 都认为贸易政策的最终形成是政策的制定者和利益集团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反映利益集团活动的主要指标就是利益集团为议员的政治活动提供的捐资。在经济学家看来，政治捐资在很大程度上能影响议员投票的结果，而不同利益集团的捐资对贸易政策形成的影响方向是不同的。⁵我们通常认为，劳工组织是非熟练劳动者的代表，由于 H-O 模型预测贸易会使美国的非熟练劳动者受损，所以劳工组织会反对给予中国 PNTR 议案，其捐资会促使议案通过的可能性降低；相反，与中国开展正常贸易会给商业集团带来巨大的利润，所以商业集团会动用捐资使国会议员为议案投赞成票。另外，“意识形态组织”也会给国会议员提供政治捐资，影响其决策行为，而“意识形态组织”对中国的所谓人权状况、劳工标准和环保状况十分不满，所以这些集团也会游说议员对 PNTR 议案投反对票，其捐资也会降低议案通过的可能性。由此，我们的分析框架要纳入三种政治捐资：商业集团的捐资、劳工组织的捐资和“意识形态组织”的捐资。

关于政治捐资，我们还需作进一步讨论。Chappell (1982) 和 Stratmann (1991) 指出，利益集团政治捐资的数额会受到议员投票结果的影响，因此政治捐资具有内生性。Baldwin and Magee (2000) 分别对三个议案的投票结果进行了单方程估计，随后对每个方程中的政治捐资作了 Hausman 检验，检验结果并不统一，有时可以拒绝捐资的外生性，有时则无法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遵循基本的理论，将政治捐资作为内生变量。根据政治学家的意见（如 Austen-Smith, 1991），议员从利益集团获得的政治捐资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议员在立法过程中的重要程度。如果国会内某个重要委员会的行动会对一些利益集团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些利益集团会对该委员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捐资。例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负责处理税收事宜，这与商业利益集团息息相关，所以筹款委员会的成员通常会从商业利益集团那里获得较多的政治捐资；而教育与劳工委员会的职能会更大影响劳工组织的利益，所以该委员会的成员往往能从劳工组织那里获得较多的捐资。另外，国会议员

⁵ Makinson and Goldstein (1994) 率先将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的捐资划分为劳工组织的捐资和商业集团的捐资。Baldwin and Magee(2000)把这两种政治捐资一同作为解释变量纳入其计量模型。

的以往投票结果都会被记录在案,各利益集团会根据议员的投票结果是否符合自身利益而为议员打分,并决定为议员提供的捐资金额。

三、计量方法与数据

(一) 计量方法

我们对 2000 年美国众议院投票表决是否给予中国 PNTR 地位这一事件进行经验检验。每名众议员作为一个样本,其投票结果作为被解释变量,对 PNTR 议案投赞成票记为 1,投反对票记为 0。这一届国会是美国第 106 届国会,众议院成员总数为 435 人,由于佛罗里达州第一选区的 Scarborough 议员对该议案投了弃权票,爱达荷州的 Chenoweth 议员从利益集团获得的政治捐资数额无法得到,所以我们将这两个样本排除,于是计量检验的样本总数为 433。

根据第二部分提出的理论框架,我们在经验检验的过程中要在计量模型中纳入一系列影响议员选举结果的变量,这些变量可以分为四大类:反映利益集团因素的变量,即利益集团的捐资;反映议员个人特征的变量;反映议员所在选区社会状况的变量;反映议员所在选区经济特征的变量。每一类所包含的变量会在下文具体描述。关于模型的设定,我们遵循 Chappell (1982) 和 Stratmann (1991) 的原则,将政治捐资作为内生变量,并按照 Baldwin and Magee (2000) 的方法,对议案投票结果和利益集团提供的政治捐资用联立方程模型进行估计。我们采用的估计手段是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 (FIML),联立方程系统的形式如下:

$$\text{PNTR} = F(A'X + A_L^* (\text{Labor contributions}) + A_B^* (\text{Business contributions}) + A_I^* (\text{Ideological contributions})) + \epsilon_p,$$

$$\text{Business contributions} = E'Y + \epsilon_b,$$

$$\text{Labor contributions} = D'W + \epsilon_l,$$

$$\text{Ideological contributions} = F'Z + \epsilon_i.$$

其中 PNTR 为众议员对议案的投票结果, Business contributions 为商业集团对众议员的捐资, Labor contributions 为劳工组织对众议员的捐资,而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s 为人权组织等“原则集团”对众议员的捐资额。由于 PNTR 为离散变量,所以我们使用 Probit 方法估计投票方程,又因为捐资数额为 0 的情形极少,因此三个捐资方程采用了线性形式。 F 是累积标准正态分布, X 是反映议员个人及其所在选区各方面特征的向量,其包含的变量会对议员的投票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 W 、 Y 、 Z 分别是决定议员从劳工组织、商业集团和“原则集团”获得政治活动捐资数额的向量。 A' 、 A_L^* 、 A_B^* 、 A_I^* 、 D' 、 E' 和 F' 是系数矩阵。 ϵ_p 、 ϵ_l 、 ϵ_b 和 ϵ_i 为方程的残差项。

(二) 数据描述

上文已经提到，我们将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和向量 W 、 X 、 Y 、 Z 中的变量分为四大类，各个变量的具体含义及其均值在表 1 中列出。

表 1 变量描述

变量	含义	均值
利益集团捐资		
Labor contributions	劳工组织向众议员提供的政治活动捐资(千美元)	75.4
Business contributions	商业集团向众议员提供的政治活动捐资(千美元)	259.4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s	“意识形态组织”向众议员提供的政治活动捐资(千美元)	38.3
议员个人特征		
Terms	议员的任职年限	10.0
Democrat	是否民主党员(“是”=1,“否”=0)	0.486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是否筹款委员会成员(“是”=1,“否”=0)	0.090
Labor Committee	是否教育与劳工委员会成员(“是”=1,“否”=0)	0.111
Commerce Committee	是否商务委员会成员(“是”=1,“否”=0)	0.122
AFL-CIO Rating	2000 年度美国劳联-产联给议员的打分(100 分制)	54.67
COC Ratings	2000 年度美国商会给议员的打分(100 分制)	61.13
ACU Ratings	2000 年度美国保守联盟给议员的打分(100 分制)	50.52
LCV Ratings	2000 年度美国保守选民同盟给议员的打分(100 分制)	46.59
议员所在选区社会特征		
No High School Rate	2000 年 25 岁以上不具备高中学学历人口比例	0.199
No College Rate	2000 年 25 岁以上不具备大学学历人口比例	0.489
Chinese Rate	2000 年华裔人口比例	0.0087
Rural Rate	1998 年乡村人口比例	0.366
Blue Collar Rate	1998 年蓝领人口比例	0.069
Unionization Rate	1998 年私人部门从业人员加入工会比例	0.213
议员所在选区经济特征		
Agriculture	2000 年从事农、林、渔业人口比例(%)	0.766
Manufacture	2000 年从事制造业人口比例	0.066
Per-capita Income	1999 年人均收入(千美元)	21.5
Unemployment Rate	2000 年失业率(%)	3.71

1. 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

第一类变量是利益集团在 1999 年至 2000 年竞选期间给每位众议员提供的政治捐资金额，单位为千美元。平均每位众议员在此期间从商业集团处获得的政治捐资总额为 259 419 美元，劳工组织和“意识形态组织”平均给每位众议员提供的捐资分别为 75 397 美元和 38 251 美元，远远少于商业集团的捐资。根据理论框架，我们预期 Business contributions 同被解释变量 PNTR 呈正相关关系，而 Labor contributions 和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s 同被解释变量负相关。各种捐资数额从 [opensecrets.org](http://www.opensecrets.org) 网站获得（详细网址列于附录）。

2. 描述议员个人因素的变量

第二类变量是描述议员个人特征的变量。议员所属党派、任职期限同样

来自于 opensecrets.org 网站。是否属于重要委员会成员的信息来自于众议院各委员会的官方网站。在克林顿第二个任期内, 劳工利益集团和民主党关系密切, 因此我们认为议员从劳工组织获得的捐资同议员是否为民主党正相关, 而议员从商业集团获得的捐资同议员是否为民主党负相关。另外, 如果议员是重要委员会成员, 则利益集团会倾向于给他更多的捐资支持, 因此我们预期捐资额与表示重要委员会的变量正相关。

上文提到, 利益集团打分的分值能反映议员的政治态度、个人愿望和社会理想, 因而本文的解释变量还包括四个最具代表性的利益集团给议员的打分情况。这四个利益集团分别是劳联-产联 (AFL-CIO)、美国商会 (COC)、美国保守联盟 (ACU) 和美国保守选民同盟 (LCV)。其中 AFL-CIO 是美国最具实力的利益集团之一, 代表着国内 1300 万工人。该集团下辖 66 个联盟, 遍及全美各行各业。从 1990 年至 2008 年, AFL-CIO 的政治捐资累计达到 1700 余万美元, 在劳工组织中名列前茅。AFL-CIO 进行游说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 由于美国进口渗透率不断激增, AFL-CIO 放弃了其长期信奉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 并且支持国会的配额议案。由于 AFL-CIO 代表的工人数量多、范围广, 因而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 已经成为反对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利益集团。COC 是代表美国工商业组织的利益集团, 下辖数百个协会, 包含不同规模的工商业组织三百余万个, 因而该集团是全美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工商业利益集团。从 1998 年到 2008 年, COC 的政治游说支出累计达到 3.7 亿美元, 高居全美各利益集团之首。COC 倡导国家间自由贸易, 是支持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ACU 和 LCV 是美国最为重要的两个意识形态组织。其中 ACU 主要倡导当代保守运动的推行, 由于其拥有一批强大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因而自 1964 年成立以来, 该组织的活动对美国政治生活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1981 年里根总统亲临 ACU 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现场, 对 ACU 的活动大加赞赏。LCV 则是关注环境问题的意识形态组织, 其通过多种方式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 号召公众保护环境, 在全美范围内影响力极强。该组织还定期评选出环境状况最差的区域, 号召公众对这些区域的行政官员和议员进行惩罚, 在 LCV 的压力下, 环境状况差的选区的议员很有可能丧失连任的机会。ACU 和 LCV 深入到美国的政治生活当中, 其历次为议员打分的成绩常被用来评价议员政治取向的重要依据。

具体到计量模型当中, 如果 AFL-CIO 给某位议员打分高, 则意味着该议员与劳工组织关系密切, 或者该议员从前的投票行为符合劳工组织的利益, 因此议员获得 AFL-CIO 的打分越高, 越倾向于反对 PNTR 议案。与此相反, COC 是重要的商业利益集团, 因此获得 COC 打分高的议员倾向于代表商业集团的利益从而支持 PNTR 议案。ACU 属于代表保守者的利益集团, 其出于对社会稳定等问题的考虑, 常常会反对贸易自由化, 尤其是针对给予中国

PNTR 待遇议案，他们认为大量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会导致国内非熟练劳动者失业或减少收入，因此会反对该议案；LCV 关注环境，常常以发展中国家不符合环保标准为由反对同发展中国家开展贸易。这样，我们预期获得 ACU 和 LCV 打分高的议员会倾向于反对 PNTR 议案。我们选取的打分结果均是这些利益集团在 2000 年为众议员的打分，其中 AFL-CIO 和 COC 打分结果来源于 vote-smart.org 网站，ACU 和 LCV 的打分结果分别来源于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官方网站。

3. 描述议员所在选区社会特征的变量

第三类变量是描述议员所在选区社会特征的变量。每一届国会都把各州分为人口大致相等的若干个选区，每个选区选出一名众议员代表该区的人民。一州之内的不同地域会存在较大的社会经济差异，因此在考察议员投票结果的影响因素时，把描述社会经济特征的变量具体到每个选区是比较科学的估计方法。根据理论框架，选区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越低、蓝领人口比例越高，代表该选区的议员越倾向于反对 PNTR 议案。因此，我们预期 No High School Rate、No College Rate 以及 Blue Collar Rate 同被解释变量（PNTR）负相关。以往很多学者对国际贸易政策进行政治经济分析时还常常加入农村人口比例和参加工会人口比例，前者能反映政府对社会公平的考虑，后者反映政府对工会意见的考虑。本文也加入这两个变量（分别为 Rural Rate 和 Unionization Rate），以考察美国政府制定对华贸易政策时，是否会关注农村人口的利益和工会的意见。美国的华裔人口数量较大，占全美人口的 8.7%，他们是否会基于自身的血统而支持美国同中国开展正常贸易，以及他们的意见是否会被议员所采纳，都需要通过经验分析来验证，所以我们在计量模型中加入了华裔人口比例这个变量。No High School Rate 和 No College Rate 的数值是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发布的《第 106 届国会选区人口及住房状况特征》中的数据整理所得；Rural Rate、Unionization Rate 和 Blue Collar Rate 的数值则来源于科罗拉多大学 E. Scott Adler 教授整理的第 105 届国会（1997 年至 1998 年）选区的人口特征数据库⁶；Chinese Rate 来源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库。

4. 描述议员所在选区经济特征的变量

第四类变量是反映议员所在选区的经济特征的变量。为了检验 Ricardo-Viner 模型预测的有效性，同时为了考察制造业和农业是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具有重大的影响，我们加入了 Agriculture 和 Manufacture 这两个变量。变量 Agriculture 为选区内 2000 年从事农、林、渔业的人口比例，因为美国的农产品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所以我们预期农业人口多的选区希望同中国开展正常贸易，来自该选区的议员倾向于支持 PNTR 议案。Manufacture

⁶ 这三个变量的数值在短期内都不会发生过大的变化，因此本文用 1998 年的数值作近似替代是可行的。

为选区内 2000 年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美国很多制造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中国竞争产品的冲击,但一些制造业生产的产品十分依赖于中国市场,所以这个变量的预期符号不确定。某选区居民的收入状况和就业状况也会影响代表该选区的议员对贸易议案的投票结果,显然,选区内居民的失业率越高、人均收入水平越低,代表该选区的议员越倾向于反对 PNTR 议案,所以我们预期 Unemployment 会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而 Per-capita Income 会与被解释变量正相关。这类变量的数值均来自于美国人口普查局(Census)发布的《第 106 届国会选区人口及住房状况特征》。

投票方程中的被解释变量为议员的投票结果,上文已经对其进行过描述。数据来源于国会季刊公司出版的《2000 年国会季度记录》。

四、经验分析结果

(一) 系数的估计结果

通过 EViews 软件,我们用完全信息极大似然法对三个捐资方程和一个投票方程进行联合估计,计算结果是经过 56 次迭代得出的,我们将估计的结果列于表 2 之中。表 2 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捐资方程的估计结果,后一部分是投票方程的估计结果。对于投票方程,我们设定 0.5 为临界值,则方程所预测的投票结果的正确率为 75.46%⁷。

表 2 计量模型中系数的估计结果

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商业集团捐资方程		
常数	219.99***	9.05
COC Rating	0.5444**	2.04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	183.94***	6.95
Commerce Committee	154.18***	6.66
Terms	2.39432*	1.93
Democrat	-92.933***	-3.44
劳工组织捐资方程		
常数	-4.9038	-0.28
AFL-CIO Rating	0.0753	1.03
Labor Committee	0.0292	0.003
Terms	-0.7708*	-1.87
Democrat	114.86***	10.35
Blue Collar Rate	41.422	0.27
Unionization Rate	126.06***	3.55

⁷ 投票方程是用 Probit 方法估计的,用这种方法估计后得到的预测值都介于 0 和 1 之间。设定临界值为 0.5 的含义是:如果真实值为 1,预测值大于 0.5 则为预测正确;真实值为 0 时,预测值小于等于 0.5 则为预测正确。

(续表)

变量	系数	t 统计量
“意识形态组织”捐资方程		
常数	3.1169	0.13
LCV Rating	0.5157***	2.91
ACU Rating	0.4973**	1.96
Terms	-1.5250***	-2.99
Democrat	2.8316	0.19
PNTR 方程		
常数	2.0067*	1.78
利益集团捐资		
Business contributions	0.0031***	4.18
Labor contributions	-0.0094***	-2.68
Ideological contributions	-0.0031	-0.92
议员个人特征		
Democrat	-0.0849	-0.20
AFL-CIO Rating	-0.0043	-1.64
COC Rating	-0.0008	-0.32
ACU Rating	-0.0088	-1.20
LCV Ratings	-0.0032	-0.60
议员所在选区社会特征		
No High School Rate	5.5189**	2.53
No College Rate	-2.3833	-1.40
Chinese Rate	1.0803	0.30
Rural Rate	0.0550	0.13
Blue Collar Rate	-31.902***	-4.09
Unionization Rate	2.2288**	2.03
议员所在选区经济特征		
Agriculture	0.5711***	2.91
Manufacture	15.639***	3.36
Per-capita Income	-0.0075	-0.39
Unemployment Rate	-0.1294	-1.28
预测正确率	75.46%	
样本数	433	
对数似然比	-7770.78	

注：*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

1. 捐资方程的估计结果

商业集团捐资方程的五个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与预期方向一致并且显著，这说明本文前面的理论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际数据的支持。COC打分高的议员将比其他议员从商业集团那里获得更多的政治捐资，而筹款委员会和商务委员会的成员获得的政治捐资也远高于这两个委员会以外的众议员，商业集团还倾向于为任期长的议员提供更多捐资支持。另外，这一阶段，民主党人同劳工组织关系密切，所以平均来看，商业集团不愿向民主党议员提供更多捐资。